

324086

20110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基本馆藏

语言風格与風格学 论文选译



科学出版社

语言風格与風格学论文选译

苏 旋 等 譯

科学出版社

1960

內 容 簡 介

风格学是語言学中的新兴的部門，苏联的語言学家对风格学的研究有极大的貢献。

本书包括发表在苏联《語言学問題》杂志 1954 年第 1 期至 1955 年第 1 期全部有关語言风格与风格学問題的討論文章和維諾格拉陀夫院士所写的總結。另外还收录了 1955 年以后見于苏联其他一些书刊的有关著作。共計十四篇。

本书对研究风格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其內容和任务都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可供研究风格学理論及研究汉语风格問題的参考。

語音风格与风格学论文选译

苏 旋 等 譯

*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 11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證出字第 06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1960 年 10 月第一 版

书号：2280 字数：218,000

196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27

(京) 0001—3,000

印张：10

定价：1.05 元

譯序

这几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的发展和党的正确领导，全国各地对改进文风問題曾經有过热烈的討論，而語言风格問題也隨着引起了我国語言学家們的注意。文风問題所涉及的范围虽然是很广的（它要求写作的人既要有高度的政治認識、正确的写作态度，又要有运用語言的丰富多彩的熟練的技巧），而語言风格的研究能够促进解决文风的一部分問題則是无疑的。不过，尽管我国語言学家們注意到語言风格問題对改进文风所能起的作用，我們却不知道要如何地研究語言风格問題，因为我們还缺乏对語言风格問題的科学知識。在这种情況之下，我們有必要向苏联的語言学家們学习他們的先进經驗，作为研究汉语风格学的借鏡。

风格学是語言学内部的一个新兴的部門，俄罗斯語言学家們对风格学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历史。近三十年来，在謝尔巴院士 (П. В. Шерба) 和維諾格拉陀夫院士 (В. В. Виноградов) 的积极活动下，苏联的风格学研究已經有了相当大的規模。苏联的語言学家們，例如彼什可夫斯基 (А. М. Пешковский)，維諾庫爾 (Г. О. Винокур)，布拉霍夫斯基 (Л. А. Булаховский)，托莫施耶夫斯基 (Б. В. Томшевский)，高甫曼 (В. А. Гофман)，拉林 (Б. А. Ларин)，李洁里 (Э. Г. Ризель)，格沃茲浩夫 (А. Н. Гвоздев) 等都对风格学的研究有过卓越的貢獻。1953—1955年之間，苏联的語言学家們还对語言风格和风格学問題进行过大規模的討論。这种討論不但推动了苏联风格学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給我們提供了学术討論的范例和风格学研究的原则性的指導。

这次討論发端于索罗金 (Ю. С. Сорокин) 在 1953 年 6 月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为紀念斯大林語言学著作出版

三周年而召开的扩大会議上所作的报告。这报告提出了一些有关风格学的基本概念的問題，引起了苏联語言学家們的反响。1954年第1期的《語言学問題》(Вопросы Языкоznания)发表了毕奥特罗夫斯基 (Р. Г. Пиотровский) 的一篇針對索罗金的报告进行批評的論文«論风格学的几个范畴»。嗣后，在1954年第2期的《語言学問題》上又发表了索罗金的論文«关于风格学的基本概念的問題»。这篇論文就是依照索罗金在会議上的报告加以改写的。《語言学問題》杂志編輯部在发表索罗金这篇論文的时候，加了一个按語，号召苏联的語言学家們繼續进行討論。接着就有許多苏联的語言学家响应了編輯部的号召，参加討論，在《語言学問題》上陸續发表了不同的意見。自1954年第1期的《語言学問題》所发表的毕奥特罗夫斯基的論文起到1955年第1期的《語言学問題》所发表的維諾格拉陀夫院士的討論總結止，前后发表了毕奥特罗夫斯基的«論风格学的几个范畴»，索罗金的«关于风格学的基本概念的問題»，布达哥夫 (Р. А. Будаков) 的«論語言风格問題»，葛利別林 (И. Р. Гальперин) 的«言語风格与語言的风格手段»，斯契巴諾夫 (Г. В. Степанов) 的«論艺术的和科学的言語风格»，阿德莫尼 (В. Г. Адмони) 和西里曼 (Т. И. Сильман) 的«語言手段的选择和风格問題»，費德罗夫 (А. В. Федоров) 的«对风格学某些概念的辯护»，列文 (В. Д. Левин) 的«論风格学的某些問題»，伊琳絲卡娅 (И. С. Ильинская) 的«論語言的和非語言的风格手段»，叶弗列莫夫 (А. Ф. Ефремов)、奧尔罗夫 (М. М. Орлов)、罗贊斯基 (А. Я. Рожанский) 等人的論文摘要，和維諾格拉陀夫院士的«风格学問題討論的總結»。这一次討論所涉及的問題有：現代俄罗斯語言是否有风格存在？风格是否独立存在的特殊的語言表达手段的系統？各种风格之間是否有相互滲透的风格要素的存在？风格的划分应以什么为标准？言語风格和言語体裁、言語形式有什么不同？文艺作品的言語言风格，个人的言語言风格是否也在风格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风格学是否可以分为語言学的风格学和文艺学的风格学？风格学是否可以分为功能的风格

学和分析的风格学？风格和全民共同語有什么关系？风格和交际場合、交际目的有什么关系？构成风格的有哪些要素？……。这是《語言学問題》創刊以來第一次的大規模的学术討論，各篇論文都給我們提供許多宝贵的意見，尤其是維諾格拉陀夫院士的总结給我們明确地指出了风格学的内容，对象和任务，使我們对风格学的研究有明确的方向。这是全世界的語言学家們都要加以密切注意的一次学术討論；預料这次討論的結果不但会推动苏联风格学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且会給全世界的风格学打开一条新的道路。

这次討論結束之后，到今天为止，已經有几年的时间了。在这一段时间里，苏联的书刊上也还零星地发表过几种討論风格学或語言风格的著作。其中有穆拉特（В. П. Мурат）所著的《論风格学的几个基本問題》（Об основных проблемах стилистики）（譯文曾发表于1959年度第3期的《語言学譯丛》上），《苏联科学院通报》（語言文学之部）上在这时期内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有关风格学的論文《高尔基的晚期政論作品的风格特征》，和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的《詞汇学、风格学和語言比較研究的問題》中所刊載的《論現代英語中成对的熟語单位的一些特征及其风格分化》。

現在我国語言学家們正在注意汉语风格学的研究，苏联語言学家們所进行的有关风格学的热烈的討論无疑地可以給我們提供許多极其宝贵的参考意見。为了使我国的語言学家們能够学习苏联的先进經驗，我們就把这些論文譯成汉语，收集在本书里介紹給我国的讀者。这些論文性質比較專門，牽涉的問題很广，翻譯起来不容易，其中可能有譯錯或不妥当的地方，请讀者多加指正。

譯 者

1959. 11. 20.

目 录

譯序.....	(i)
論风格学的几个范畴.....	毕奥特罗夫斯基 (1)
关于风格学的基本概念的問題.....	索罗金 (20)
論語言风格問題.....	布达哥夫 (42)
言語风格和語言的风格手段.....	葛利別林 (62)
論艺术的和科学的言語风格.....	斯契巴諾夫 (77)
語言手段的选择和风格問題.....	阿德莫尼、西里曼 (86)
对风格学某些概念的辩护.....	費德罗夫 (96)
論风格学的某些問題.....	列文 (108)
論語言的和非語言的风格手段.....	伊琳絲卡姪 (121)
风格学問題論文概述.....	《語言学問題》編輯部 (130)
风格学問題討論的总结.....	維諾格拉陀夫 (141)
論风格学的几个基本問題.....	穆拉特 (180)
高尔基的晚期政論作品的风格特征.....	奧甫察伦科 (223)
論現代英語中成对的熟語单位的一些特征及其风格分化...	厄里揚諾娃 (244)

論风格学的几个範畴

畢奧特羅夫斯基 (Р. Г. Пиотровский)

大家知道风格学問題的研究是很落后的，其所以落后，有几个原因。

第一，在风格学的范围内确定研究的对象，这事情本身，和語言学其他部門的类似的任务比，就困难得多。这是容易理解的，因为語言要素(詞、形式等等)的风格特点的輪廓常常是薄弱的，有时甚至是模糊不清的，远不如它在詞彙或語法方面的基本意义来得明确。就是因为这个緣故，在风格的分析当中，科学的結論实际上往往被印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評价所替代。

第二，語言单位的风格学分类原則不仅同語言材料在語音学、詞彙学和語法学方面的①分类原則不相符合，有时甚至有显著的差別。

第三，語言的风格規范的演变，比起語言的語音体系、它的語汇成员、尤其是它的語法构造的演变来，要快得无可倫比。同时，风格的变化，不仅在不同社会、不同职业和不同年龄的說話人集团中是不平衡的，而且在个别的个人方面也是这样的。由于这些关系，建立共同語的风格規范常常有极大的困难。

①譬如，从語法学的观点看来，*je marchai, tu marches, il marcha, nous marchâmes, vous marchâtes, ils marchèrent* 等法語形式乃是动詞 *marcher* 的简单完成体 (*passé simple*) 的一套詞形变化。从风格学的观点看来，这些形式并不一致。*je marchai, il marcha, ils marchèrent* 等形式属于书面語的风格，但在口头的文学語言中有时也能遇到。*tu marches, nous marchâmes, vous marchâtes* 等形式具有明晰的古代书面語的音响，而在口语中则是不被容許的。（参閱馬地汝 [Ph. Martinon] 《怎样說法語》，第 347 頁，1927 年巴黎版。）

第四，某些語言学家在他們的风格学研究里，限于运用文学語言的书面形式，有的时候，并且固步自封于艺术作品語言的領域。因此，只有艺术文語言所特有的风格現象就被看做是整个語言所固有的現象。所有这些风格学研究的困难，都已經在規定风格学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时，使人感覺到了。

*

*

*

讓我們回到言語(語言)风格这个概念上面来吧！在語言里来划分它的个别风格的原则，目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描述。許多語言学家都把言語风格看做是和某一文学体裁有关的全民共同語的变形。論到文学語言风格的时候，这种分类的原则就特別干脆地被貫彻着。

我們可以引李洁里（Э. Г. Ризель）所著的一篇論文《就斯太林著作的观点來論风格問題》为例。著者在这篇論文里提到一切語言所共有的一般的风格体系的时候，写道：和事务的、时評的、其他种类的风格相反的艺术文的风格可以分为三种“体裁的风格”，即戏剧、詩歌和文艺散文的风格。“不但如此，”李洁里接着写道，“詩歌的风格之内又可以重新分为許多具有特殊規律的小类。于是，就产生了人民歌曲、歌謡、十四行詩等风格。”^①

叶菲莫夫（А. И. Ефимов）也遵循着体裁风格的原则，区别现代俄罗斯文学語言和其它“艺术文-小說的风格，在这后者的組成員里分出两个主要的变形：詩歌和散文的风格。”叶菲莫夫接着写道：“这些风格又分出一些变形，即諷刺风格、寓言风格等等。因为有这种文学体裁，例如寓言的存在，就有—切的根据来说寓言的风格是历史上形成的具有这种文学体裁特点的使用詞汇的言語手段、言語方法和言語方式的体系。”^② 叶菲莫夫也在区分社会时評、职业技术、科学、公文和尺牍等风格的情况下采用体裁原

① 李洁里，《就斯大林論語言學問題的著作的观点來論风格問題》，見《外語教學》第2卷，第14—15頁，1952年莫斯科版。

② 叶菲莫夫，《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初年俄罗斯文学語言发展的某些問題》，見《語言學問題》，第4期第31頁，1953年莫斯科版。同时參閱他的《关于艺术作品語言的研究》，第11頁，1952年莫斯科版。

則。① 虽然不是那样的明白清楚，这种看法总还可以溯源于格沃茲洁夫（А. Н. Гвоздев）教授所提出的俄罗斯語言风格的分类法。②

語言风格分类的体裁原則，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已經有許多世纪的历史。在古代詩学（亚里斯多德的三种风格和古印度的风格理論）里，它就被采用过。法兰西古典主义的詩学和风格学的风格分类法也是以体裁为根据的。（例如，布阿罗——Буало——在他的《詩的艺术》里所依靠的作为馬列柏——Малерб——和蕪日尔——Вожл——的语言学派的固定的准则与指标的三种风格的理論）。

在现代西欧的语言学里，語言风格分类的体裁原則被所謂新語言学派的代表們广泛地采用着。这是明显的。佛斯勒尔（К. Фосслер）和克罗奇（Б. Кроце）語言学派就認為艺术文的语言，更正确地說，个别作家的语言，在“創造性”的作用方面是突出的，是全民共同語的更有組織和更生动的基础。

应当注意：主张风格的体裁分类的人們，反对划分全民的语言风格和艺术文的语言风格，認為它們只不过是统一的共同語的风格的不同部門。然而，語言的风格规范的发展指明：与某一特定的体裁有关的语言风格的划分，已被客观地證明只适合于个别語言及其文学规范发展的某一特定的时期。例如，任何人也未必要反对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年为止的俄罗斯文学体裁的精密的风格的描述。我們可以說到十八——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語言之內的寓言风格；克勒罗夫（Крылов）、苏馬罗可夫（Сумароков）、或德米特列夫（Дмитриев）等人在其寓言里选择詞汇、成語、句法、同义詞等等的共同性可以做为实例。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文学語言里，在“黄金时代”的古典拉丁語里……，可以精确地追溯語言风格的体裁原則的划分。

然而，我們未必能够把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散文的风格财富局限于艺术-小說风格的狭窄的范围内。我們也

① 参阅叶菲莫夫《俄罗斯文学語言发展的某些問題》，第 31 頁。

② 参阅格沃茲洁夫《俄語风格学概論》，第 14 頁，1952 年莫斯科版。

就因此而不可能把十九和二十世紀的俄罗斯詩歌的各种风格式样只局限于“高雅”詩歌的风格里。难道我們能够拿語言手段的观点来談論果戈里、謝德林 (Щедрин)、愛倫堡、依里弗 (Ильф)、或彼德罗夫 (Петров) 語言的划一的諷刺风格嗎？在杰米昂·別德諾 (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 和米哈尔可夫 (Михалков) 的寓言风格里，到底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也許只在运用寓意的手法去采用一些动物的名称方面，是这样的。然而，这个事实与其說是风格學的，不如說是詩学的。

把語言风格固定在这一种或那一种文学体裁上，只可作为文学的某一流派的特征。例如，古典主义的美学严格地限制在某些特定的体裁里要采用某种言語风格（在喜劇里采用口說的現行的言語；在散文里采用书本的言語；在詩歌里采用高雅的风格）。相反的在浪漫主义，特別是批判的現實主义的美学規范里，却容許甚至于要求同一个作品范围内的各种不同言語风格的自由变异和結合。果戈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Золь)的作品里所有的广大的社会图景，不是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的命运的描繪，而是有許多人物參預其間的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历史糾紛的描繪。这一切都要求作家們去广泛地吸取包含在全民共同語的不同风格里的描写可能性。“在普希金的影响下而巩固起来的情况之下，”維諾格拉陀夫(B. V. Виноградов)写道，“在先进的俄罗斯文学里，現實主义就是按照各种社会的生活、文化、以及言語习惯的特殊性而深入地反映现实的方法，它要求作家們对語言艺术的风味，对俄罗斯社会的不同等級、不同集团的社会言語的风格有广泛的認識。”①

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俄罗斯文学里，特别是在苏維埃的文学里，“大众的”和多方面的作品作风的固定，終于肯定了并提供了这种公認的权利：不仅在整部或整章作品的范围内，而且在每一段甚至于每一句話的范围内，可以更換不同的风格要素。相反的，只在

① 維諾格拉陀夫，《果戈里的語言及其在俄罗斯語言历史中的意义》，見《俄罗斯文学語言史資料与研究(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第3卷，第15頁，1953年莫斯科版。

作品里采用一种言語风格，却成为了非常少見的現象。这种“单一风格”的結構，多半成为諷刺作品的資料，或成为作者的文体貧乏的标志。

在俄罗斯、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以及其它高度发展的語言的风格区域内工作着的每一位語言学家，都感觉到传统的体裁原則的风格分类法的假定性和任意性。在这个意义上，應該承認索罗金（Ю. С. Сорокин）所及时提出的关于修正对“語言风格”^①这个术语的传统了解的主张。然而，虽然索罗金正确地指出不同要素在艺术文語言里的經常的結合，“和某种文学或文字的体裁相适应的任何封閉的語义-风格的体系”^②的缺乏，他却把这个論断推广到整个民族共同語上面去。在索罗金認為“对某种言語风格的鑑定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各种語言手段在語言上下文里的相互关系的原則和彼此結合的方式”^③的时候，他作出結論說，风格的概念本質上是和上下文的概念相一致的。問題的这种解决引向对言語风格在語言里的客觀存在的否定。

但是，把这种認為語言风格就是“表达手段的合理的組織体系”^④，就是全民共同語的变形的科学概念消除了去，就意味着基本的风格学范畴的灭亡。这也威胁着这个重要的語言学部門的存在本身。为着摆脱这个危机起見，索罗金提議把风格学分为分析的风格学和功能的风格学两种。“分析的风格学的直接任务”，著者写道，“就是研究詞与語言形式在同义上的联系和确定詞和語言形式在其同义体系的某一特定的情况下全民使用的界限。”^⑤分析的风格学只纪录詞、形式和句法构造的一定的风格可能性。可見，

① 参阅索罗金（Ю. С. Сорокин）《論风格学的基本概念》，見《在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于 1953 年 6 月 19 至 23 日所举行的紀念斯大林 著作出版三周年的公开扩大會議上的报告提綱》，第 13 頁，1953 年莫斯科版。

② 同上，第 13 頁。

③ 同上，第 15 頁。

④ 参閱維諾格拉陀夫《俄罗斯文学語言史的任务，主要是十七—十九世紀的文学語言》，見《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語言之部》，第 3 版，第 225 頁，1946 年莫斯科版。

⑤ 索罗金的上舉的提綱，第 13 頁。

分析的风格学應該研究风格資料的財富目录。相反的，“功能的风格学則研究在言語上下文里和同样意义以及与发言用途有关的詞的选择、淘汰和結合的具体原則。”^① 所以，功能风格学研究风格手段在个别风格(上下文)中的应用。

由此可見，索罗金在它所建立的体系里，似乎頗以沒有言語的风格而自滿。其实，各种語言风格的客觀存在是不容反駁的，并且这是每个运用某种語言說話或写作的人所感覺到的。也許在方言学研究的实践里，各种言語风格的客觀存在特別清楚地显示出来；甚至沒有學問或識字很少的农民們，对不同的言語风格也很熟識。有时，某些詞或形式的意义之难于解释明白，照例都是这些詞，語法形式或語句和某种言語风格的互相关系的問題。(参考：风格的評价往往是来自方言学家之听取人們說方言：“这是城市的說法，然而这却是我們的說法，乡村的說法”，“这是科学的說法”，“報紙上，书本上是这样写着的”，等等。)

現行口語的研究指出：在說話人的意識当中，发音的变异、詞、語法形式和語法结构的风格意义，不仅是以固定可能性的形式零散地存在着(参考：索罗金的“分析的风格学”)，而且具有体系性的特点。^②

① 索罗金的上举的提綱，第 13 頁。

② 所引“感情語言风格”的例子取自我在方言学研究实践中的情况。为編纂莫尔达維亚方言图表而采用的調查表內，有查明物主冠詞 ал 形式的問題。按莫尔达維亚語的文学語言的規范，这个冠詞是按“性”和“数”变化的(ал-а-ай-але)；方言与俗語却普遍地只有一个形式——a。但是有一次，完全是偶然的，日常生活中的詞“сын”、“ребенок”、“лошадь”、“дом”等不被采用，而給农夫暗示出“书本上”的詞，“карандаш”(Крејон)，和这个詞結合在一起的必須应用物主冠詞。被詢問的人——不通語法的老人——用流行的文学語言回答說——У крейон ал meu (我的鉛筆)。很特殊地，除了书本上的詞的形式以外，他还用了文学語言發音的不定式冠詞的形式(拿 ун 去代替 u)和 meu 去代替方言俗語的物主代名詞 n'ey。随后把这个結構暗示给农夫，但是他所少見的詞“карандаш”却被日常生活中的詞“лошадь”所代替。他拿俗語的冠詞和物主代名詞的形式來回答——у кал а н'ey 对于是否不可以說 у крейон а н'ey (即把“学者”的詞跟俗語的語法形式和語音形式統一在一起)这个問題，被詢問的人就加以否定的回答。在場的同乡都贊同的时候，他就確定地說，“正确的莫尔达維亚語只能說 у кал а н'ey，不能說 ун крейон ал meu”。在和其他乡村的居民談話中重复我的試驗时，到处都是类似的结果。不言而喻，通晓語法和有學識的人們通晓故乡語言风格系統的程度要高些。

任何风格学的研究都显露出言語风格的客觀存在。言語风格并且是不露形跡地出現在以否認这些风格为方針的索罗金的体系里的（“把大自然赶出門外——它又从窗口钻进来”）。指出“分析的风格学的直接任务就是研究詞与語言形式在同义上的联系和确定詞与語言形式的全民使用的界限”^①（着重点是我加的一毕奥特罗夫斯基），認為必須进行“修訂現代語詳解辞典里所登載的有关风格体系的注释”^②的时候，索罗金已經暗地里承認了全民共同語的某些特定的变形即风格的存在这一事实。要知道，使用某一語言要素的界限，只能够由言語风格加以相当的确定，然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有关风格的注释并不指明某种語言要素是属于哪一种語言风格的（参考下面）。

索罗金的报告显露出怀疑言語风格的客觀存在的傾向，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正反映着在风格現象的分类中所发生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受这些現象的独特的、多方面的特点所制約的，因为这些現象在其本身中反映出和結合着語言的語法、詞汇、以及語音体系的各种要素。概括地說，这就是出現在力求寻找一般的与个别的之間的正确联系的研究者面前的科学綜合的困难。科学綜合的类似的困难对資产阶级齐列龙（Жильерон）学派方言学家們來說，是不可克服的。齐列龙学派的方言学家們在批評“地方方言”的科学概念时，只承認现实的个别的方言現象。把作为語言符号体系的語言和个人言語对立起来，而認為这体系是由个人言語来实现的德·索胥尔（Ф. Де Соссюр）在确定个别的和一般的之間的正确关系的問題上，也遇到这同样的困难。

我們不應該离开現象的功能來看現象，即不應該把个别的和一般的对立起来。列宁写道：“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③ 絶對不能够只因为觀察某种“純粹的”风格的困难就放弃了言語风格的一般的概念。

① 索罗金的上举的提綱，第 13 頁。

② 同上，第 16 頁。

③ 列宁，《哲学筆記》，第 363 頁，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

在艺术作品的语言中对各种语言风格所加的固定的配合，还不意味着语言风格实际上不存在。“一般的含义，”列宁指出说，“是矛盾的：它是僵死的，它是不纯粹的、不完全的，等等，而且它也只是认识具体事物的一个阶段……”。^①语言风格的概念是抽象的，它正确地反映着语言内部的客观联系。

代表着“在语义上具有封闭性，在表达上受到限制，但可以协调组织的表达手段的体系”^②的语言风格的客观存在，说明了不同于其他社会现象的语言的某些特殊性质。交际的各种范围、条件和任务的存在，引起了语言功能的不同形式的产生。我们可以提供口语和书面语、对话和独白的存在来证明这个原理。不同的交际目的反映在日常生活、科学-事务、以及艺术文各语言形式的划分之中。

语言功能的这些不同的形式经常地相互影响、相互交错着。风格现象的相互传播的多面性，是划分和鉴定语言变形以及语言形式时发生困难、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例如，某些语言学家就喜欢把语言风格的概念和语言形式与语言变形的概念混为一谈。^③他们认为，因为语言功能的每一个形式通常是以语言材料的特殊选择为特点的，而选择语言材料的问题又是“风格”的科学概念的主要成分，所以，谈论俗语和文学语言的风格、对话和独白的风格而把“规范”、“语言”、“形式”等术语放在一边，是更方便的。

把语言风格的概念跟语言变形的概念混为一谈的语言学家们，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分别原因和结果。实际上，决定如何从一系列的同义成分中选择出某些要素的，是引起语言功能的分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284页，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

② 瓦诺格拉特夫，《俄罗斯文学语言史的任务，主要是十七一十九世纪的文学语言》，见《苏联科学院通报，文学与语言之部》，第3期，第225页，1946年莫斯科版。

③ “语言（语言）风格”和“语言形式”这两个概念的混淆，譬如说，在阿莫索娃的整篇论文《从斯大林论语言全民性的学说联系到英语的语言风格》里是特别有趣的（参考《列宁格勒大学公报》第5卷第35页以次，1951年列宁格勒版）。关于这方面，可比较上面已经提到的李洁里和叶菲莫夫的论文。

支、变形和各种形式的存在的历史条件、环境、交际形式和交际目的的不同。结果就形成了这种选择，即言语风格的一般规范。虽然固定的言语风格在功能上和语言的某些形式与变形有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完全符合。所以，如果说语言材料的特殊选择是科学-事务语言的特点，这还不是说这材料不能在艺术文言语中被采用。相反的，科学-事务的语言，有时也可以变为日常生活语言的风格资料。口语风格可以在书面语言里被采用（譬如，在文艺作品中的对话），反之，也可以使口语构成书面语言所特有的风格。

从另一方面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语言变形都有同样的选择语言材料的原则。例如，我们不能说什么统一的艺术文风格，因为艺术文所采用的语言手段，普通是各种各样的风格所固有的。我们也决不能说什么文学语言的一般的风格。文学语言是民族共同语的高雅的、加工的形式，它为广大的交际群众服务，而于书面的和口头的、对话的和独白的、科学-事务的、艺术的和日常生活的语言形式里发挥它的功能。但是，所有这些语言形式在选择语言材料上却都有差别。

可见，言语风格是建立在语言功能的变形和形式的相互影响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功能原则应该是划分风格的基本原则。^①说到体裁原则，它是依赖个别风格和一定的文学体裁之间的暂时的和不经常的联系的。这些联系并不受言语风格的内部特点所制约，它们是由于某些文学派别的一定的诗学、美学的立场而产生的。

* * *

表情风格的特点这个概念，是风格学家所采用的许多基本概念中的一个。其它的语言学部门，尤其是词彙学，也经常采用这

^① 我们可以在谢尔巴的著作里找到这种划分语言风格原则的最彻底的应用（参阅谢尔巴《现代俄语文学语言》（见《俄语教学》第4卷，第21—23页，1939年莫斯科版）。阿莫索娃企图在规定英语的风格当中应用功能标准（参阅上举的阿莫索娃的著作，第33页）。

些概念(参考:詞的风格特点)。然而,就是在这里,也明显地发现有不清楚的地方,有时甚至于发现有风格特点这个概念的内部矛盾,很不相同的現象往往奠基在这种风格特点之上。由此,就容易相信編纂詞典时所以采用有关风格的注释体系的道理了。

例如,在烏沙可夫(Д. Н. Ушаков)主編的《俄語詳解詞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里,风格的注释可以归为五組:

- (一) “指出口語变形的注釋”:会話的、俗語的、狎語的、儿童語的、庸俗語的、隱語的、学校語的、地方語的;
- (二) “指出书面語变形的注釋”:书本的、科学的、技术的、专门的、报纸的、輿論的、文牍的、正式文件的、詩歌的、民間詩歌的;
- (三) “在現代語言的詞里建立起历史背景的注釋”:新的、教会典籍的、老的、陈旧的;
- (四) “說明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物体和概念的詞的注釋”:历史上的、革命以前的、外国的;
- (五) “指出詞的描写性色彩的(表情的)风格的注釋”:嘲罵的、諷刺的、不贊同的、戏謔的、看不起人的、蔑視的、責备人的、庆祝的(“只在庆祝风格中被采用”)、修辞的(“只在修辞的、感动人的、或使听众对事物的某一方面受到感动的风格里被采用”)、婉轉的(“在为隐匿、掩盖某些不体面的事情而拿婉轉的說法去替代直接的表达时被采用”)。①

以上的五类注释的排列,至少是依据以下三个分类原則的:和某一特定的言語风格(第一和第二組)的相互关系;和历史、社会、职业等題目(第三、第四組及第二組的一部分)的相互关系;詞(第五組)的估价、情感的特点。加之,这些不同的分类原則并不是到处都很彻底的。包括在第二組內的“专门的”或技术的註释,与其說是和特殊的“技术的”或“专门的”风格的联系,不如說是和某一

① 烏沙可夫(Д. Н. Ушаков),《俄語詳解詞典》,第1卷,第25—28頁,第13—17节。